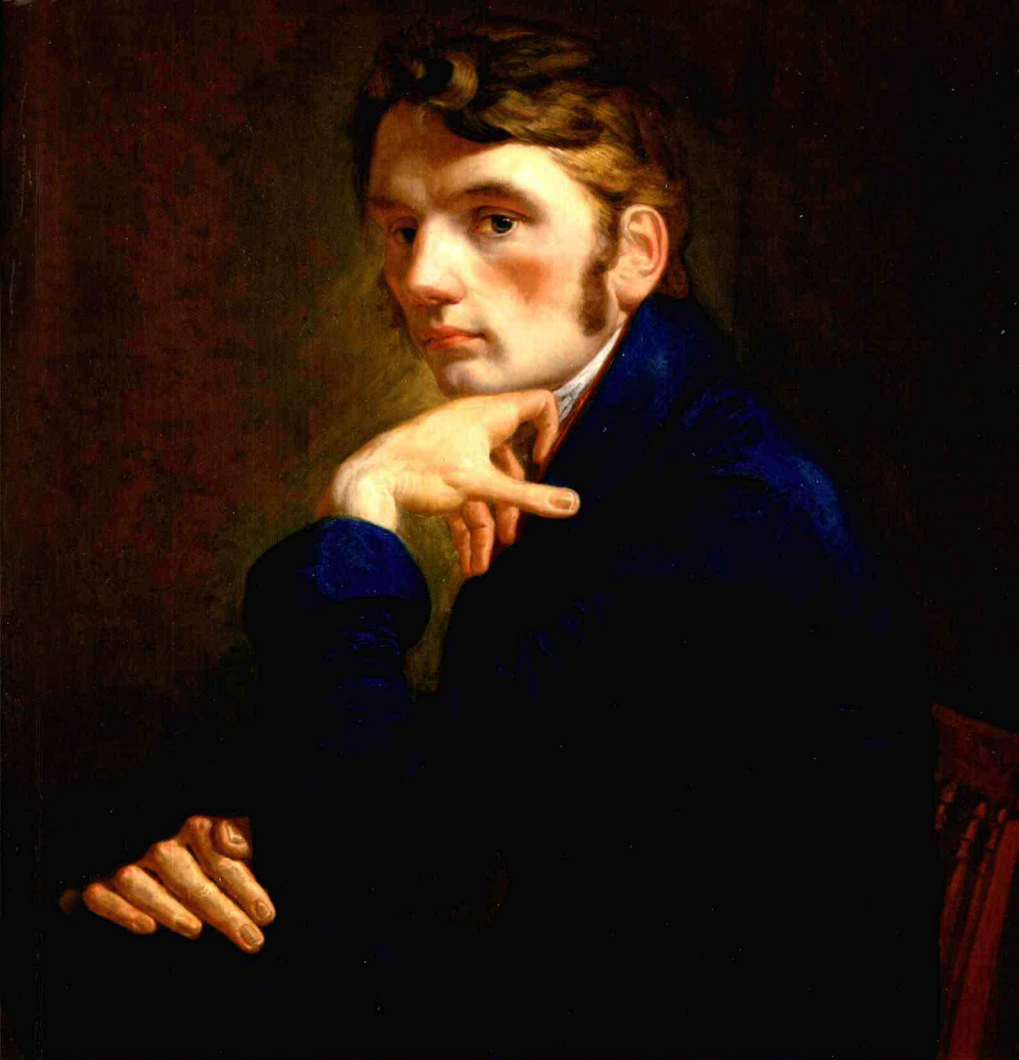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少年维特之烦恼

[德] 歌德 / 著 张佩芬 / 译



PENGUIN CLASSICS

企鹅经典

少年维特之烦恼

[德] 歌德 / 著 张佩芬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维特之烦恼/[德]歌德(Goethe,J.W.V.)著;

张佩芬译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8.3

(企鹅经典)

书名原文: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

ISBN 978-7-5366-8984-8

I. 少… II. ①歌…②张… III. 书信体小说 - 德国 - 近代
IV. I516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0650 号

少年维特之烦恼

SHAONIAN WEITE ZHI FANNAO

[德]歌德 著

张佩芬 译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阿华 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刘玉浦

特约编辑: 谢仲伟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中青印刷厂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5.875 字数: 132 千

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我读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

叶兆言

歌德出生的时候，中国的曹雪芹正在埋头写《红楼梦》，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”等到歌德开始撰写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曹雪芹早已离开人世。从时间上来说，少年维特开始风靡欧洲之际，《红楼梦》一书也正在坊间流传，悄悄地影响着中国的男女读者。很显然，相对于同时期的欧洲文化界，歌德已是一位对中国相对了解较多的人；但是事情永远相对，由于时代和地理的原因，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并不真实，自始至终都难免隔膜和充满误会。欧洲当时推崇的中国诗歌和小说，差不多都是二流的，甚至连二流的水准也达不到。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以证明歌德对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有所了解，虽然歌德的家庭一度充满了中国情调，他家一个客厅甚至用“北京厅”来命名。

歌德时代欧洲的中国热，不过是一种上流社会追逐异国情调的时髦，在《歌德谈话录》一书中，歌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烈口吻说：

中国人在思想、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，使

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，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、更纯洁、也更合乎道德。在他们那里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、平易近人的，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……

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似乎很内行的话，有意无意地暴露了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无知。歌德心目中，中国人的最大特点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：金鱼总是在池子里游着，鸟儿总是在枝头跳动，白天一定阳光灿烂，夜晚一定月白风清。中国成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，成了诗人脑海里的“理想之国”。歌德相信，除了天人合一的和谐，中国的诗人在田园情调之外，一个个都很有道德感，而同时代的“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”。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，歌德特别举例说到了法国诗人贝郎瑞，说他的诗歌并非完美无瑕，“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”。

歌德被德国人尊称为“魏玛的孔夫子”，这种称呼在明白点事的中国人看来，多少有些莫名其妙。事实上，歌德并不是什么道德完善的圣人，他也不相信仅仅凭单纯的道德感，就能写出第一流的诗歌。任何譬喻都难免有缺陷，说歌德像孔夫子，更多的是看重他文化上的地位。以诗歌而论，歌德更像中国的杜甫，他代表着德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；以小说而论，说他像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，也许最恰当不过。歌德被誉为“奥林帕斯神”，是“永不变老的阿波罗”，与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孔子相比，他更文学，更艺术。

歌德生前曾相信，他的小说不仅风靡了欧洲，而且直接影响了遥远的中国。杨武能先生《歌德与中国》一书中，援引了歌

德的《威尼斯警句》，从中不难看到歌德的得意：

德国人模仿我，法国人读我入迷，
英国啊，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
憔悴的客人；
可对我又有何用呢，连中国人
也用颤抖的手，把维特和绿蒂
画上了镜屏？

这又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，如果歌德明白了大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，明白了当时耸人听闻的文字狱，他就会知道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古老和遥远的中国绝不可能流行维特和绿蒂的故事。此时的大清帝国处于康乾盛世尾声，正是乾嘉学派大行其道之时，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，无论诗歌还是小说，都是不算正业的旁门左道。歌德并不真正了解东方的中国，而中国就更不可能了解西方的歌德。歌德的伟大，在于已经提前预感到了世界文学的未来。他相信在不远的未来，世界各国的文学将不再隔膜，那时候，不仅西方的文学将相互影响，而且神秘美妙的东方文学，也会加入到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来。歌德近乎兴奋地对爱克曼说，他越来越相信诗是人类共同财产，随时随地正由成千上万的人创造出来，任何人都应该因为写了一首好诗，就夜郎自大地觉得他了不起。歌德充满信心地发表了自己的宣言，他认为随着文学的发展，单纯的民族文学已算不了什么，世界文学的时代正在来临，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“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”。

中国人知道歌德，起码要比歌德了解中国晚一百年。有趣

的是，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订，虽然零零碎碎可以找到一些文字数据，证明歌德这个名字早已开始登陆中国，然而歌德作品的真正影响，并不是来自遥远的西方欧美，而是来自不很遥远的东方日本。歌德并不是随着八国联军的洋枪大炮闯入中国。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思想基础上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动机，首先是“富国强兵”，是“船坚炮利”的物质基础；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文学艺术。以古怪闻名的辜鸿铭先生也许是最早知道歌德的中国人，他在西方留学时，曾与一个德国学者讨论歌德，话题是这位大师是否已经开始过气，而他们的结论竟然是完全肯定。在辜鸿铭笔下，歌德最初被翻译成了“俄特”，所谓“卓彼西哲，其名俄特”。

最初有心翻译介绍歌德作品的中国人，应该是马君武和苏曼殊，这两位都是留日学生。王国维和鲁迅在各自的文章中，也曾以赞扬的语调提到过歌德，他们同样有着留日的背景。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，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都与近邻日本紧密联系。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我们似乎已习惯了跑到邻居家去借火沾光，革命党人跑去避难，年轻有为的学生跑去求学，为了学习军事，为了学习文学或者科学。最终引起了战争也好，输入了革命思想也好，反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。说到底，歌德在中国的真正走红，无疑要归功于郭沫若在1922年翻译出版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而郭之所以会翻译，显然又与他留学东洋期间，这本书在日本的家喻户晓有关。众所周知，歌德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《浮士德》，但是要说到他的文学影响，尤其是对东方的影响，恐怕还没有一本书能与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相比。

不太清楚郭译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之后，中国内地一共出版

了多少种译本，影响既然巨大，数量肯定惊人。也许多得难以统计，根本就没办法准确计算。经过上网搜索，只查到了一位日本学者统计的数字，迄今为止，在日本一共出版了四十五种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这是个惊人数字，却很容易一目了然地说明问题。任何一本书，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，通常都有产生影响的基础。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渗透，不难发现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歌德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他作家。时至今日，读者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早已五花八门，同样是经典，有人喜欢英国的莎士比亚，有人喜欢法国的巴尔扎克，有人更喜欢俄国的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基，还有人喜欢各式各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但是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特征的现代文学，却一度被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弄得十分癫狂。年轻的读者奔走相告，洛阳顿时为之纸贵，由“维特热”引发为“歌德热”，显然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。

回顾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“歌德热”，无疑以两个时期最有代表性。一是五四之后，这是一个狂飙和突飞猛进的时代，思想的火花在燃放，自由的激情在蓬勃发展，郭沫若译本应运而生，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年轻人，立刻在维特的痛苦中找到了知音，在维特的烦恼中寻求答案。爱情开始被大声疾呼，热恋中的男女开始奋不顾身，少年维特的痛苦烦恼引起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思考。一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经过了十年的文化浩劫，启蒙的呼唤声再次惊天动地响起，世界文学名著在瞬间就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畅销书。1982年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，纪念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，“歌德与中国·中国与歌德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当时的西德海德堡召开，中国派出了以冯至为首的代表团。冯是继郭沫若之后，歌德研究方面的

最高权威。

比较两次不同时期的“歌德热”，惊人的相似中，还是能够发现某些不一样。譬如在五四以后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在读者市场几乎是一枝独秀，它成了追求恋爱自由的经典读本，引来了为数众多的模仿者。这得力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风气，得力于当时的青春豪情与热血冲动，正好与歌德写完小说的那个时代相接近，维特的遭遇深入了人心，文学革命最终引发了社会革命。八十年代的歌德热却呈现出了多样性，一方面，作为世界文学名著，歌德再次赫然出现在书架上，与其他的一些世界文学大师相比，他的作品虽然也畅销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压倒优势。在过去，看歌德的作品，更容易与年轻人产生心灵感应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在今天，与阅读其他大师的作品一样，更多的只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，具有重读经典的意味。这是个只要是文学名著就好卖的黄金时代，而在歌德的一系列作品中，又以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销量最多，各式各样的译本也最多，无论印多少都能卖出去，但是说到了影响力，已很难说是最大。歌德所预言的那个世界文学时代终于到来了，据资料统计，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，歌德作品的翻译品种，数量销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除了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其他的作品恐怕都很难说是畅销。

为什么到了今天，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还会有那样的生命力？这显然是与读者有关。文学作品的最大阅读人群，从来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。以今天的习惯用法，“少年”维特其实应该是“青年”维特，当初郭沫若翻译的时候，用的只是汉语的古意，古人称“少年”为青年，与今人所说的少年儿童并不是一个意思。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这个少年就不是指小孩。

“少年中国”和“少年维特”，都是非常具有五四特征的词汇，这里的少年特指青春年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，与幼稚的孩童无关。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在过去拥有读者，在现在仍然还能拥有读者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被年轻人所喜爱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，无论科学如何进步，年轻人总是有的，年轻人的追求和烦恼也总是有的。只要有年轻人，有年轻人的追求和烦恼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就一定还会有读者。

此外，从世界文学相互交流的角度去考察，同样是歌德的作品，为什么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会比更具有人性深度的《浮士德》，更容易受到读者欢迎？除了是很好地迎合年轻人的阅读心理，恐怕也与散文体的更容易翻译和诠释有关。毫无疑问，世界文学的交流一方面势不可当，但是不同的语言之间，仍然还会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。诗无达诂，小说比较容易再现原著的神韵，只要故事大致不太离谱，创作者的本意，翻译者比较容易传达，读者也比较容易把握，而讲究韵律的诗歌就大不一样。中国的好诗很难翻译到国外去，欧洲的好诗同样也难以翻译成中文。虽然歌德的《浮士德》已出现了好几个中文译本，可是读者在接受叙事诗风格的《浮士德》时，总是不能像接受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那么来得直截了当。

233年前，25岁的歌德奋笔疾书，只用了四个星期，就完成了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从此以后，这部小说一直在影响着世界，感动着后来的年轻人。今年重庆出版社重点引进了企鹅版世界文学名著，这是一套非常优秀和具有广泛影响的丛书，它的选目的权威性早已不容置疑。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很自然地应该名列其中，并且排在第一批名单里。面

对年青一代读者，在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面前，如何选择一套既经典又权威的版本，如何配备最精致最优美的译文，确实是一件极其为难却又必须认真去做的事情。好的丛书从来都是充满智慧，它代表着一种相对比较成熟的阅读趣味。众所周知，企鹅经典在它的原产地英国之所以大获成功，是因为把经典阅读带给了普通大众，而此次重庆出版社和企鹅的合作，战略目标却是另一个思路，那就是把企鹅经典在中国的购买对象，界定为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鉴赏力的人群。换句话说，必须与时俱进，必须针对图书市场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，大胆地走先提高后普及的道路，应该不是一个冒险的尝试。

2007年4月17日 河西

英文版导读

—

“今年春天，”克里斯蒂安·克斯特纳在 1772 年写道，“歌德从法兰克福来到了这里（韦茨拉尔）。他是一名法学博士，二十三岁，一位阔绰父亲的独生子。他来这里实习进修是奉父命所为，按他自己的意愿，则是去追随荷马和品达等人。无论天分如何，他的思想与心灵促使他朝这条路去迈进。”

小城韦茨拉尔在法兰克福的南面四十公里处。城里大约有 4000 左右常住人口，其中近四分之一都供职于法院。当歌德在 5 月 25 日去帝国最高法院报到之后，他已经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；像父亲和祖父先前所做的一样，他在韦茨拉尔将获得宝贵的社会经验和交际关系。不过歌德在当时早已是引人注目的诗篇《葛茨·冯·伯利欣根》和其他一些戏剧的作者。他很有可能被发现正躺在一棵大树下的绿草地上，跟他的朋友高特·冯·古额、冯·齐曼塞格和孔尼格谈艺论道，而不是去投身于法律职业事务中。歌德经常独自一人或者三五结伴去到哥本汉姆附近的村庄散步，诵读荷马和哥尔德斯密斯的作品或是《圣经》。很多时候，他也会坐在菩提树的荫凉下与村民和孩童们聊天。村里有一位小学校长的女儿，她比歌德长寿一些。在作家死去的两

年之后去世，她一直都没有忘记歌德以及耶路撒冷等其他那些到村里来的年轻人。直到后来，她还经常会向外来的观光者们展示歌德曾经坐过的木凳。

来到韦茨拉尔不久之后，歌德在沃坡特桑森附近举行的一个舞会上，第一次遇到了那个名叫夏洛蒂·布甫的女子。同样是在克里斯蒂安·克斯特纳写给朋友奥古斯特·冯·亨宁斯的那封信里，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：“在 1772 年 6 月 9 日那天，歌德和我以及我的女友在乡村舞会上邂逅。我来不及在启程时跟着马车一起走，所以就让我的女友和其他同伴先行出发。歌德博士当时也在马车上。也就是在那里，他认识了夏洛蒂……他并不知道夏洛蒂已心有所属。……他已经彻底地被她征服了。”

夏洛蒂·布甫当时刚满十九，在家里的十一个孩子中，她是次女。她的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海因利希·阿戴姆·布甫是德国骑士团在韦茨拉尔的驻地官员。夏洛蒂是一个纯真、聪颖而又活泼的姑娘，一双眼睛幽蓝深邃。当克里斯蒂安·克斯特纳在她十五岁那年第一次遇到她时，不忧不惧、温和恬静而又知书达礼的夏洛蒂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不仅有一颗充溢着快乐的心，而且也在用她的快乐去感染着别人。在接下来的数年中，克里斯蒂安·克斯特纳对夏洛蒂的倾慕与日俱增。特别是当夏洛蒂的母亲在 1771 年去世后的那几年，她扛起了家里的重担，用一颗宁静平和且充满关爱的心来处理家事。夏洛蒂成了不可缺少而又惹人疼爱的人。她回报了克斯特纳的爱，在歌德来到韦茨拉尔的第四个月，克斯特纳成了众所周知的夏洛蒂的“未婚夫”——歌德和他的朋友们在当时经常用这个词来指歌德自己，而在四十年后，当他写作自传《诗与真》的时候，歌德再次用到的这个词却是指克斯特纳。

歌德用四十年的追忆记录了他所发现的夏洛蒂那可亲可爱，纯真活泼的品性，他写到，“无论哪里，只要她在，就洋溢着无忧无虑恬静从容的气息”。绝不仅仅是因为她能带来家庭的福音，歌德认为，任何一个男人都愿意将夏洛蒂当做自己心仪的人。饶有趣味的是，他更多地是把夏洛蒂描述成一个能使人内心愉悦的女子，而不是会激发火爆热情的人。歌德对克斯特纳也颇有好感，他突出的品质是“镇定平静，彬彬有礼，头脑清晰，言行坚定”。歌德认为他是一个勤勉刻苦而又通情达理的人。

而在克斯特纳的眼中，歌德留给他的清晰印象就是一个卓尔不群的青年。“他才华横溢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，也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。他有非凡的生动的想象力，帮助他去通过形象和寓言来表达自己。”在给冯·亨宁斯的信中他这样说，“他是一个激情四溢的人，但他也有相当大的自我控制力。他有一颗高贵自由的心，可以摆脱偏见我行我素，而不顾及是否迎合了其他人受欢迎的风行一时的口味。他憎恶任何形式的强制，经常置身于他喜爱的孩子们当中。”

夏洛蒂、歌德和克斯特纳三人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在自传的追忆中，作者将这段开始于1772年那个愉快夏日的友情描述成“一首真正的德国田园诗歌”。在《诗与真》里，年老的歌德将那个漫长的夏天描绘成了梦幻一般令人欢欣的季节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乡村里的美丽女子带来了堪与诗文媲美的纯洁的情感愉悦。漫步田园，置身在日渐成熟的谷物丛中，聆听着百灵鸟的歌唱，这三个朋友形影不离。或者，至少是他们中的两个难分难舍。有时候，“未婚夫”因公务缠身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共度美好时光。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歌德在与夏洛蒂并肩而行。

克斯特纳是个敏锐但又宽容的人。他的品性促使他去保持友谊而不是激发无理的嫉妒，不过克斯特纳也并不总是乐于看到夏洛蒂与歌德亲密。早在六月底，他就在日记中写到，“从此之后，一旦当我完成了手头的工作，我就立即去看我的女友，每次我都发现歌德博士也在那里……他爱夏洛蒂，然而，他更是一个达观的人，对我也是一片诚心好意。他并没有在意我匆忙赶来就是为了与女友共度良辰。尽管我对他也是心怀好意，可是，我并不乐意看到他单独与我的女友在一起，哄她开心。”

在他的自传里，歌德暗示出新的三人友谊并没有什么摩擦。他认为，他与夏洛蒂的关系无论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和挫折，都是人们在渴望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时，包含在幸福体验中的自然的组成部分。他写道：“如果，就像人们说的那样，最伟大的幸福只有在渴望中才能找到，而真的渴望总是必然针对那些无法得到的东西时才有”，他以评说第三者的口吻说，“那么，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，要使我们看到他命运的这个青年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他对一个早已许配他人的女子的钟情，他试图将外国文学经典译介到民族世界，同时也被自己所领会的努力，以及他不仅用文字也用铅笔和画刷来倾心描绘自然的努力，尽管没有什么恰当的技巧——所有的这一切都足以把他的胸怀填充得满满当当。”

夏洛蒂和歌德的行为都严格地恪守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界限之内，他们之间只是一种纯洁的感情。当然，要说这里没有任何文饰是不可能的。原因之一在于歌德是抱着某种信念来进行小说创作的，他将过去的邪念都清除了。另外一个原因则是，最后分别的那一刻终于还是在 1772 年夏天到来了。夏洛蒂迫不得已，只好告诉歌德，不要期待她能回报他的爱情。“她对他说，除了

友谊，他不能再期望别的什么”，克斯特纳在他8月16日的日记里这样写到，“他一下子就变得脸色苍白，神情沮丧。”

不到一个月，歌德就离开了。在9月10日那天晚上，他还去见了夏洛蒂和克斯特纳，在一番长谈之后，夏洛蒂激励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，无论这次分别之后是否还能再度聚首。歌德又一次变得垂头丧气，情绪低落。在第二天清晨七点左右他就不辞而别，离开了韦茨拉尔。他只给夏洛蒂写了一张道别的短笺，希望以后还能再会。在回忆了刚刚过去的那个甜蜜而哀伤的夜晚之后，他说，“我现在又成了孤身一人，这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。我愿你们美满幸福，而我，将永远走不出你的心灵。”

夏洛蒂（克斯特纳告诉我们）看到短笺之后泪如泉涌，而克斯特纳还得为歌德因粗鲁唐突的离开而受到的谴责辩护。与此同时，年轻的作家已经踏上他奔赴科布伦茨的征途。他在那里遇到了他的朋友梅克，女作家索菲亚·冯·拉·罗希与她担任枢密顾问的丈夫，还有他们十六岁的女儿玛克西米阿妮。歌德在《诗与真》里告诉我们，“在原先的激情退却消逝之前，如果能有一股新的热情在内心发出召唤，这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”歌德非常喜欢玛克西米阿妮，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夏洛蒂，在外貌上也更接近于少女玛克西米阿妮·冯·拉·罗希，而不是夏洛蒂·布甫。然而，在玛克西米阿妮这里，歌德再一次地遭到了绝望的厄运。在他们认识两年之后，玛克西米阿妮嫁给了法兰克福的一位中年商人。

歌德还与他在韦茨拉尔的那些朋友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。在十月初，他听到了那里传来的谣言（后来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）说他的朋友冯·古额自杀了。“我尊重他的选择，”歌德在10月10日写给克斯特纳的信中这样说，不过他还是在后面加了

一句，“我希望我永远都不会给我的朋友们带去这样的消息。”不到三个星期之后，又传来一条关于自杀的消息，这次的传闻却是事实：卡尔·威廉·耶路撒冷在10月29日晚上举枪自杀，第二天中午气绝身亡，当天晚上就被埋葬了。

耶路撒冷的年龄比歌德略小一些，1747年出生在沃尔夫比特尔一个具有严格宗教信仰的家庭，后来去布伦斯威克接受高等教育，此后在莱比锡和歌德一起研读法律，后来又转到了哥廷根，1770年在那里毕业。他是一个驯顺而保守的青年，但深深地仰慕着当时卓越的作家莱辛。1771年9月，他在韦茨拉尔找了一份给布伦斯威克使节冯·赫夫勒担任秘书的工作。在韦茨拉尔，他所有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绘画，做诗，以及思索哲理，偶尔也去参加歌德与朋友们在韦茨拉尔或哥本海姆的聚会，但他与歌德从未密切接触。耶路撒冷显然并不认同克斯特纳对歌德的高度评价，他有时候还会用傲慢的口吻将歌德说成是一个“花花公子”或“三流作家”。

在《诗与真》里，歌德回忆中的耶路撒冷是个很有教养的绅士，生着一张圆脸，一对蓝眼睛，头发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。“他的衣服是仿照英国的式样做的，这在德国北部并不常见：一件双排扣常礼服，浅黄色的皮马甲，一条马裤。”歌德还特别忆及了他描绘荒芜景致的兴趣，以及他对一个有夫之妇的感情。按照克里斯蒂安·克斯特纳的说法，耶路撒冷早已被韦茨拉尔的上流社会所鄙视。他是一个孤独的人，喜欢沉思默想，经常一个人在月光下久久地漫步。他还曾写过一篇为自杀辩解的文章。克斯特纳觉得正是耶路撒冷对伊丽莎白·赫德的感情最终将他彻底击溃了。“我不认为她会在意那些轻浮的流言，但无论如何她的丈夫都算是一个极其容易妒火中烧的人。所以可以说是他